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0期(民國107年6月),129-134 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吕迅,《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》

北京: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2015。407頁。

任天豪*

「棋局」的概念在歷史論述中,意義與經濟學門常討論的「賽局」,往往 異曲同工。事實上,無論棋局或賽局,身處其間者未必都是欣然加入。被迫成 爲一員者,所在多有,就如《大亨小傳》中被動變成蓋茲比(Jay Gatsby)情 敵的湯姆(Tom Buchanan)一樣。雖然《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》的英文題名 Butterfly and Dragonfly: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Cold War, 1944-1950 並無 "Game"的字樣,而是暗示意義很強的「蝴蝶與蜻蜓」,此待後文論述,但中 文題名的「棋局」,仍能充分傳達國共之爭裡的某種「無奈」。

「無奈」的原因在於,本書所謂的「大棋局」正是國共雙方即便想下,卻實在無法隨心所欲落子的一盤棋。國共雖是各據棋盤一方的棋局正主,起手前的斟酌卻總免不了被身旁觀眾指指點點,甚至在其吆喝怒斥、掄拳作勢之下,不得不對棋盤外的狀況多所遷就。於是這盤棋局顯然已不是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決,國、共都各自成了更大棋局中的棋子之一。即使作者主要的描述內容是被當時國、共雙方理解爲「內戰」的那段歷史,在本書中或許可被理解爲更大棋盤的「冷戰」。

作者將 1944 至 1950 年間的七個年頭,以七個章節各自描述,將二戰後期 到國共風雲變色的大局變遷,清楚地用遞移脈絡展現。同時,以不敘明角色性

^{*}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

質的方式,將國、共、美、蘇、日、英等主要成員,如何在中國大陸權力戰場上「下棋」的決策內涵與出手背景,進行以檔案爲主要史料依據的學術論述。當然,自第一章的「美國至關重要」逐步走到第五章「呼啦啦大廈傾」、第六章「中國向何處去」後,接著的是第七章「革命進行到底」,已然可見國民黨爲讓美國協助己方,使得美國成爲更重要的「棋手」,在美國動向撲朔迷離、棋局走向益發不利的時候,加強了對手(蘇聯及中共)對棋局的影響力,從而造成局勢的根本扭轉。此種以棋局比擬時局的手法固非少見,但透過明確的章節編排,便可令讀者將國共衝突到兩岸分治的歷史,放到內部權力牽動不已的「大棋局」中,清楚、順利地解讀。

正由於本書是從二戰尾聲的 1944 年開始,走筆至冷戰已然展開的 1950 年,此種安排也可看出作者對那段通常被視爲「國共內戰」的歷史,有更宏觀的看法。該看法即國共「內戰」未必只有內戰性質,在二戰尚未結束的 1945 年時,國共皆已體認美國對戰後局勢至關重要,卻又有著不同的因應態度,從而使得棋局走向複雜難解之途。中國大陸變色之後,同樣仍因國共對美國及蘇聯態度的臆測,使得原本期望解決的內戰問題無從著手,反而打了場「國際」的「戰爭」——韓戰。國共內戰並非國共雙方對奕的棋局,而是各方牽制而各自身不由己的「大棋局」。國共內戰延續自二戰,也持續與冷戰互動,始終具有深刻的國際性質。

本書可謂相當成功地將傳統美國外交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,即「誰丢了中國」(Who Lost China)的關懷,融入內容之中。然而若只是此種辯論的延續,便如同重彈半世紀前的老調,學術意義有限,故以本書作者兼具東、西方教育與人文、社會領域訓練的知識背景,應不致陷入此種窠臼。果然,作者雖然採用「檔案研究法」與「多元檔案對照法」(Multi-archival Method)等在外交史、國際史學界最爲強調的「西方式」研究方法撰寫本書,¹卻並未因此

L類研究方法大抵脫胎自外交史研究,而外交史乃係奠基於歐洲歷史發展而出現的學科。諸如關注民族國家利益、民族主義或強權的興衰等性質,均成為蘭克(Leopold von Ranke, 1795-1886)所謂「科學式歷史研究」的內涵,見唐啓華,〈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〉,《興大歷史學

成爲「西方式」的論述成果,而是在能夠大量應用各方檔案(如前蘇聯、中國 大陸乃至於臺灣所藏的官方檔案)的情況下,呈現一個「兼容並蓄」的作品, 即本書在外在形式上,能因彙整呈現各方檔案而顯得平衡;於內在性質方面, 又能清楚指向問題意識。而本書的問題意識,也與多數的研究稍有不同,即「國 共間的『內戰』眞是『內戰』」嗎?

事實上,類似本書取徑的研究也非完全沒有,例如文安立(Odd Arne Westad)的 Decisive Encounters: The Chinese Civil War, 1946-1950.² 但文安立 較偏向探討冷戰之所以肇生的內涵,該書也因此成爲「冷戰國際史」(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)的代表作之一,與本書的問題意識仍有些許差異。此外,文著畢竟是外國學者的成果,長期以來,華文史學界終究仍較缺乏類似視角的研究。

過去對國共政治衝突的探討,從較早建立「典範」的蔣永敬等前輩學者始,至劉維開、楊奎松等兩岸中堅世代的學者止,大抵依循嚴謹的「實證史學」(Histoire positiviste)規範。雖然不乏對國共關係以外關懷的研究成果,數量終究有限。例如劉維開〈蔣中正對 1949 年失敗的檢討——以演講爲中心的探討〉,著眼於蔣中正(1887-1975)在遷臺後的歷次演講主題中所透露的訊息,其中多包括軍事、黨務及教育,非僅國共關係而已;³楊奎松則多以中(共)蘇關係或毛(澤東,1893-1976)史(達林,Joseph V. Stalin, 1878-1953)關係爲切入點,探討中共在國共內戰期間得失的因由。⁴其他如金沖及《決戰——毛澤東、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》等同樣具有學術價值的專著,大致仍以

報》,期 15(2004年10月),頁 202。故本書實係以「西方(歐洲)式」歷史研究方法所建構而成的嚴謹學術著作。

Odd Arne Westad, *Decisive Encounters: The Chinese Civil War, 1946-1950* (Redwood City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).

³ 劉維開,〈蔣中正對 1949 年失敗的檢討——以演講爲中心的探討〉,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, 期 29 (2008 年 5 月),頁 85-125。

如楊奎松,《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(1920-1960)》(臺北:東大圖書公司,1997);楊奎松,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》(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9)。

當時的「人」或「黨」爲焦點。⁵雖然楊奎松亦撰有較接近本書概念的專著《「中間地帶」的革命: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》,但楊著或仍基於作者對中共黨史的深度認識,而在論述上較集中於中共面向。⁶也因如此,本書雖未在中文書名裡置入「國際」的元素,寫作脈絡卻十分清楚地貫徹「國際因素」的條理,在華文相關研究中,顯示獨樹一格的價值。

正因本書其實本著對美、蘇在國共衝突時的態度與行動而作,是以即使將長達七年(1944-1950)的發展情形融於一本四百頁上下的專著時,難免出現某些其他研究成果已有的內容,不過仍然不會因此減損作者的論證力道。例如有關蔣中正與史迪威(Joseph W. Stilwell, 1883-1946)的不和導致中(華民國國民政府)美關係稍挫,由此加深美國對中共同情程度等歷史,學界已有許多優秀研究。⁷但本書從舊有史料中的一個已被時人注意的記載,即謝偉思(John S. Service, 1909-1999)所提及、並在當時已被重點劃記的「我們不必爲國民黨政府垮掉而害怕」,體現美國逐步調整其對華態度的趨勢之始(頁 62)。雖然據此言說,難免有羅志田所謂「倒放電影」之嫌;但就史料論史事,作者確有證據支持。同時,雖然同以史迪威事件論析國、共、美三方關係,本書卻能一則彰顯外國因素在此棋局中的意義,二則實踐作者所欲探討的國際脈絡,是在大時段範圍下的精細處理之例。

又例如毛澤東訪蘇時「(對史達林)搞『鬥』爭」乃至「搞失蹤」的相關 論述,雖然沈志華等學者亦多有論及,但本書作者以部分時人回憶錄、日記等 側面史料佐證,認爲應僅是毛澤東健康不佳所致的舉動,而非策略性地逼迫史 達林就範,「與斯(史)大(達)林結怨,萬一弄成不好看,反而不美」(頁

⁵ 金沖及,《決戰——毛澤東、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》(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12)。

楊奎松,《「中間地帶」的革命: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》(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0)。

⁷ 學術專著如齊錫生,《劍拔弩張的盟友: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(1941-1945)》 (臺北:聯經出版公司,2012年修訂版);或單篇文章如楊天石,〈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〉, 《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——蔣介石日記解讀》(香港:三聯書店,2008),卷2,頁367-408。其 他成果恕不贅舉。

318)。不可否認的是,此一看法不僅不同於多數專研此領域的學者,以側面 史料爲主所建構的推測也稍有風險,但也讓本書對毛澤東訪蘇並能遂行其期盼 的結果,做了符合其「大棋局」框架的解釋。另一方面,也讓大棋局中的毛澤 東等個人圖像,多了些「凡人」而非「權謀家」的形象內涵。此種處理是好是 壞,頗難論定,但至少能在偏向上層思維的政治外交史(High History)中,⁸ 增添些許不同景緻,實也是種「粗中有細」的手法。

本書英文題名中的「蝴蝶與蜻蜓」應有隱喻,前者或易於聯想,應係指蝴 蝶效應(Butterfly effect),後者則可能暗示奕棋者的渺小,意爲棋局中的變 化不僅彼此影響,棋局中的對奕者亦或僅能如蜻蜓一般,無力撼動大局。據此, 本書意欲彰顯的主體——實由國共和衷共濟方可完整體現的——「中國」,便 成爲棋局之中,形式上或有主動性,實則多受掣肘的行動者。例如中(共)蘇 簽訂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》之後,本書闡釋史達林所以不顧毛澤東志在必 得的攻臺期望,卻向朝鮮半島施加動能,正是蘇聯此一「觀棋者」對另一「觀 棋者」美國動向的推測所致。此種處理確能體現當時蘇聯方面的意志,及中共 受限於條約規範及現實實力的無奈。當然,「棋局」至少需要兩席對奕,因此 雙方的分量理應相當。故若能透渦更多的美方、臺方檔案,建構國民黨政權在 1950 年前後的思維與行動,更能體現「整個中國」——蓋當時兩岸政權均強 調中國代表之權——在棋局中的「蜻蜓」之身。如中情局於 1949 年 3 月即已 在「假設中共會繼續親蘇並在戰時成爲蘇聯盟友」的基礎上提出警告等等美方 檔案,9對於「觀棋者」美國的動向有何影響;或者再多參考諸如臺灣《外交 部檔案》中的相關資料,應更得以印證本書所指棋局的性質與影響。不過,本 書雖然在國民黨政權方面的爬梳與理解,猶尙不能與共產黨方面並論,但以作 者身居對岸、往來臺灣相對不易的情況下,已經是不能苛責的表現了。

比較建議的是,本書所謂的「棋局」,其實是可以嵌入「冷戰」的解釋框

⁸ 唐啓華,〈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〉,《興大歷史學報》,期 15,頁 203。

Problem Development in Taiwan, 1949/03/14, ORE 39-49, 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, p. 3.

架的。作者雖在「後語」中提及不以「冷戰」論述的理由,係不欲因此模式「兩分世界」,而想「說說意識形態以外的東西」(頁 371)。此種學術關懷與視野,固然值得肯定,卻也因此失去與新冷戰史領域對話的機會,同時也不免顯現作者對當今冷戰史研究的些許誤解。事實上,即在如前述冷戰國際史的新發展中,便已放眼於許多跨越國境、乃至「陣營」(bloc)界線而具有包括文化、種族、宗教等其他性質的議題,例如「文化冷戰」(the Cultural Cold War)的視角。又或者是在如雷納茲(David Reynolds)的研究中,提出各種非政治、意識形態因素所造成的全球劃分,10均體現「冷戰」早已非如傳統理解上的「意識形態區分」。也因如此,倘若作者能與更多冷戰史領域學者交流,或能在本書已然體現的「大棋局」之上,尋得更多的「蝴蝶」與「蜻蜓」。反之,冷戰史領域也應對本書投以更多關注,使各界對本書的理解得以跨越「民國史」的範疇,促成更多的交流價值。

¹⁰ 以上概見夏亞峰,〈近十年來美英兩國學術界冷戰史研究述評〉,《史學集刊》,2011年第1期,頁107-117。